

4. 歷史知識、集體記憶和社會變遷

現在，我們把上述的內容貫穿一下。我們強調，歷史意識在華人的社會裡，不論就個人或社會立場來看都非常重要，接著我們探討什麼是「歷史性思維」，然後我們就說歷史性思考是一個「具體性思維」，也是「脈絡化的思維」，使它和哲學思考、經濟學思考有本質的差異。接著我們講歷史知識的特徵，我們歸結到歷史知識跟物理學知識有很大的不同，物理學知識沒有方向性，不引導人走向哪裡。可是這樣講可能並不是很公平，牛頓科學固然沒有一個方向性，達爾文固然沒有方向性，但是隨著牛頓科學所展開的機械式宇宙觀，以及達爾文科學的演化社會政治觀，也是有它的方向性，只不過歷史知識的方向性更清楚，它指向人的自我了解。歷史知識是由人所創造，可是一但歷史知識被創造出來，就會有它的自主性，不復爲人所控制。我們在第一講中帶領同學各位思考時間的奧妙、深厚、偉大，以及人面對時間的渺小和無奈。第二講帶領各位同學思考一旦歷史知識被建立後，它會產生自主性，因此歷史知識容易被不同的時代加以批判，乃至超越，甚至被不同的人所出賣。這種問題要怎麼解決，這是我第二講留下來給各位思考的問題。第三講講到建構歷史知識過程中歷史解釋這個最重要的工作，歷史解釋集中在因果解釋的問題，最後以蜘蛛作爲比喻，人好像蜘蛛一樣，人創造歷史就好像蜘蛛結網，蜘蛛在網裡很高興，但是人也被網絡所制約，從這裡我們看到歷史的多元性、複雜性，以及歷史與人的關係。

讓我們進入第四講，說明「歷史」與「人」的關係——歷史知識、集體記憶和社會變遷。這一講延續到社會學的領域，我們說歷史知識有它的「自主性」，這是哲學家柯靈吾（Robin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講法，歷史知識一旦被創造，常常不是創造者的意志能夠控制，儘管歷史的創造者，都想規範歷史發展的方向。歷史知識雖有其自主性，但是歷史知識和歷史以外的社會、經濟的領域，卻有非常複雜的關係。

首先，我們從歷史知識作爲集體記憶講起。中國人都是「歷史人」，中國文化是用歷史的審判取代宗教的最後審判，歷史知識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在中華大地上，歷史作爲一個集體記憶，最鮮明的表徵之一就是蘇州寒山寺。我記得我在還沒讀小學的時候，日據時代的台灣人爲了保存漢文化，民間自己編輯漢文讀本，我剛開始認字就學漢文。我還沒上小學所背的一首詩叫做〈楓橋夜泊〉，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¹⁵之句。全世界大概很少像蘇州寒山寺那麼小的一個寺廟，因爲一千年前一個人的一首詩，而成爲東亞知識分子共同的集體記憶。很多日本人到中國觀光，一定要到寒山去撞鐘。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寒山寺撞鐘的價錢節節加碼，因爲日本人過去的漢文教育，寒山寺成爲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象徵。寒山寺很小，但是廟不在大小，就在那一首詩，那一首詩和它所代表的那

¹⁵ 楊牧：《唐詩選集》（台北：洪範出版社，1993），頁 199。

一段歷史，進入成爲整個東亞知識人的集體記憶。歷史知識透過集體記憶而影響社會變遷，我再舉一個例子，陝西出土大量秦帝國的兵馬俑，於是在當地發掘然後直接蓋一個博物館，考古工作人員就在那裡挖，觀光客就在旁邊走，所以考古人員也被博物館化。秦俑博物館是世界最大的幾個觀光點之一，當地的農民就做小兵馬俑來賣，生活也因此改善。他們有一段順口溜：「幸福全靠秦始皇」。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歷史經驗，被細膩化、系統化以後的歷史知識，成爲兩千年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直到今天還在照顧秦俑博物館附近的陝西農民。歷史在華人的土地上，不是一個木乃伊，而是一個很大的圖書館，我們可以進去圖書館與古人對話，以今天的苦悶向古人告解，要向古人求取答案，歷史知識經由集體記憶而影響到社會變遷。

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之間有什麼關係？這可以有兩種講法：第一種是認爲歷史知識反映社會的變遷。二十世紀史學大師錢穆（賓四，1895-1990）寫《國史大綱》，書中充滿民族主義的情操，反映抗戰時期中國人抵抗倭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氛圍，《國史大綱》中的歷史知識可以視爲抗戰時代的精神氛圍的反映。進一步來說，現在國中的《認識台灣》課本，特別是其中的社會篇，是代表台灣權力結構改變以後新的權力網絡在歷史知識上的一種反映，標示了十幾年來台灣的社會變遷。

第二種說法是說歷史知識可以主導社會變遷的方向。我們談到許多次司馬遷，司馬遷寫《史記》這本書，宣稱是受孔子《春秋》這本書的啓發。《春秋》這一部書，對《史記》影響很大，司馬遷認爲孔子作《春秋》有其特殊用意：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¹⁶

寫歷史是爲了撫慰苦難的人間，爲了引導社會向上提昇，所以歷史知識應該要主導社會的變遷。這兩種講法，都有它的見解，也都有它的問題。

我要以「集體記憶」爲中心，對這兩種想法再加申論。歷史知識與社會政治變遷的關係之間有一種「互相滲透性」。我們曾說歷史知識有它的方向性，歷史知識不是物理知識，歷史知識有一種方向感，要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尤其是中國的歷史著作，充滿遊俠的義氣、酷吏的惡霸、忠臣的血淚，它是有方向感的。人的存在，不只是生物學的事實，也是文化的事實，因此歷史知識必然要對社會變遷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是社會變遷又如何和歷史知識取得聯繫

¹⁶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1370。

呢？人在社會、經濟變遷的時空網絡裡建構歷史知識，因此歷史知識必然受到社會的政治、社會變遷的滲透與影響。讓我們以怵目驚心的文化大革命時中國大陸的歷史知識的再塑造為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唐代女主武則天（624-705）這個歷史人物，突然成爲普遍受到重視的女性統治者，這是因爲江青及其四人幫，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所以社會、政治的變遷，也會滲透到歷史的解釋上。

再舉一例，光復初期台灣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作爲集體記憶，在這十幾年來的台灣權力轉變的過程中，重新被塑造，被解構，乃至有意的加以部分的遺忘。舉例來講，台灣的二二八受難者，不只是包括台灣人，還有孤苦無告的外省人，而且台灣的二二八受難者因爲在當地有家族宗親，五十年以後仍以受難人家屬身份討公道；外省籍的受難人在台灣孤苦伶仃，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期間被抓去處死，連骨頭都沒有，沒有後代，沒有人幫他平反，這種外省人也很多。但是近年來在二二八的歷史記憶重新塑造的過程裡，外省人受難經驗被刻意抹煞和忽略，因爲權力是掌握在台灣人手裡。你就可以看到社會政治的變遷，和歷史記憶之間是有多麼複雜的滲透關係，這裡的關鍵就是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社會學家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提出的說法，哈伯瓦克是受到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影響的社會學家。

歷史知識對社會政治變遷的滲透，對於每一個社會的成員而言，是如何經由集體記憶，使歷史知識的社會變遷產生滲透作用呢？有兩個管道，第一個是正式結構，就是指正式的教育體制。這種體制常常是政府所設置的，比如說九年國民教育，一直到國立大學，它都是國家的權力所設置的，因此，正式的教育體制與權力結構、既得利益階級必然互相呼應。正式化的教育體制，常常不能免於政治權力以及經濟生產關係的既得利益階級的滲透。比如說，台灣過去的歷史論述，有意把反攻大陸塑造成台灣人共同的使命，政治結構是把歷史經驗轉化成人民的集體記憶一個有效的工具。

第二個管道我們可以稱爲「非正式結構」，就是與國家公權力、國家權力比較沒關係的各種活動，如民俗曲藝、歌謠、小說、電影等等。民間的民俗曲藝，也傳遞一種集體經驗，例如薛平貴征西、穆桂英掛帥、崑曲中的竇娥冤等，都成爲中國文化人的集體記憶。即使是專制時代的帝王也不敢逆天行事，因爲有竇娥這種集體記憶在那裡。正式結構和非正式結構並行於社會，使人們透過各種途徑來攝取歷史知識，無形中會引導社會局勢的變遷。

在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正式結構與非正式結構如果差距過大，會導致集體記憶分享者人格的撕裂。正式的結構所傳遞的價值系統、歷史記憶，如果與非正式的事實之間差距過大，就會導致人格分裂，這是從歷史知識對社會變遷，經由集體記憶影響這一點來講。第二點，從社會經濟變遷對歷史的滲透來談，我們就會發現，從結構內部的網絡裡來講，社會政治生態的轉變，必須要有新的意識形態支持，這會使人們產生重建歷史知識的壓力。講到意識型態，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代文化人類學大師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3-）有一本《文化的

解釋》(*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s*) 對這個問題有所分析。

社會變遷對歷史的影響，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講，第一個角度是社會政治生態的轉變，一定會產生新的意識型態。關於「意識型態」問題，我想引用吉爾茲在書裡的第四章，他講到作為文化系統的意識形態，意識型態和學術思想不一樣，意識型態是替特定階級服務的，並且容易為特定階級所壟斷；學術思想正是經由對意識型態的批判，而來解構意識型態。吉爾茲的論證比較複雜，各位同學將來可以進一步讀他的著作。社會政治變遷對歷史知識滲透的第二點是：由社會政治結構與歷史知識的關係來看，社會政治網絡裡的各個階級、各個價值系統是一種競爭的關係，勝利的一方往往會要求新的史觀，以便合法化它的權力地位，這一點就具有中國文化特色。我進一步來講，在中國的歷史上，權力的鬥爭常常表現為歷史解釋權的鬥爭；倒過來說，歷史上中國權力的掌控者如果沒有同時掌握意識型態，特別是歷史解釋權，他的權力構造就會像是在沙灘上蓋樓房。因此，權力結構的轉變，對歷史知識必然產生一種滲透作用。

我們以「集體記憶」作為中心，接受並批判兩種舊有的學說：一種是反映說，一種是主導說。我們以集體記憶為中心來講，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之間是一種互相牽扯、彼此滲透的關係，任何一個方面都無法單向主導，因此會產生「雙重主體性」。所謂「雙重主體性」是說在歷史知識的世界裡面，有一套價值，但是在實際的政治權力世界裡面，勝利者才是正確的，於是我們看到，「力」和「理」之間不僅有一個落差，而且很緊張，有力量的不一定是道理的，在現實的權力世界裡，有道理的人在現實常常是一個被打擊者。歷史發展中似乎有一種「雙重的主體性」關係，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是：社會政治的變遷，最後會導致新國家的建構，「國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什麼叫做「國家」？國家作為一個概念，是由一群人在一塊土地上成立一個政府並擁有主權的政治組織，這個定義有一點模糊，不過基本上是展現右派知識份子的觀點，是比較形式主義思維的。這種定義中的國家是政府部門、行政組織以及民意機構等所組成。但是「國家」比我們想像的形式的那些要素更為複雜。讓我們從黑格爾講起。黑格爾曾經說過：國家可以克服一種矛盾，這種矛盾是個人作為市民，與個人作為個體之間的矛盾。比如說我們作為國家的公民，要犧牲一部份的自由，要服兵役，要納稅，來換取國家對我們的保護。可是作為一個個體，許多人希望不要當兵最好。「國家」的建立，是克服個人作為市民跟個人作為個體之間的矛盾的非常重要的工具。黑格爾對「國家」的定義，到馬克思得到一個很大的修正，青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現在所謂的國家，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管理他們內部事務的俱樂部而已。「國家」是這樣複雜，但是更有啟發的則是受到馬恩所影響的當代女性社會學家 Theda Skocpol，她所寫《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這部書，以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為例子，來吸收並且修正馬克思、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到列寧 (Wladimir I. Lenin, 1870-1924) 關於革命的講法。她的書裡有一個重要的觀

點，她指出：國家一但建立以後，就有它的自主性，而且許多國家之間會形成結盟關係。因此歷史知識如何在國家及國家聯盟建立以後，確保它的自主性？歷史知識如何不被國家國權力所滲透？所顛覆？乃至不被諸多國家聯盟所扭曲？這值得我們加以深思。

我們的第三個結論是，集體記憶是歷史知識與政治社會變遷的橋樑。集體記憶本身並沒有自主性，集體記憶是中性的，它可以用人為力量加以修改、創造，也因此歷史學家的史德就變得非常重要。